

### 城市中心与日本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举办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

作者: 李国庆 发布时间: 2005-9-8 14:30:49



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出新的思维范式。

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与日本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于2005年3月14日至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国际研讨会”。26位日方参会人员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者,5位学者宣读了他们关于中国的研究论文。我院来自社会学、经济学与产业学界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7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

举办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背景是,近年来中国和日本经济在总量上的差距日益缩小,经济互补性越来越强,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国经济的崛起对日本经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2004年日本经济全年增长率达到13年来最高增幅,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出口增长按年率计算高达20%,而出口增长主要对象是中国,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与此同时,两国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出现了严重摩擦和冲突,民族对立情绪不断升级,出现一种冷战状态。这种“政冷经热”的不协调状态向日本学者提出了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将研究重点放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上,希望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学者进行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迫切希望了解日本学者是如何分析和看待今天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变化,同时期待着通过学术交流得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有序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观点,为

#### 一、中国社会研讨会的几个主要议题

14日中国社会研究会的第一个学术报告主题是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春玲首先从“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反分层社会和制度形态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这三点来概括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接着指出,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报告认为,1978年以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时间大约是1978-1984年左右,在这一阶段,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趋于减弱;第二阶段时间大约是1985-1995年左右,这一阶段收入差距开始拉大;第三阶段时间大约是1995年至今,这一时期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快速增强,经济收入趋于两极分化,形成了我国现存的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报告最后对“断裂化”、“中产化”、“结构化”和“碎片化”四种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和特征加以分析判断的观点做了评价:在分化形态上,“断裂化”和“中产化”两种观点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正趋向于两极分化的、上下对立的、对立的社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将形成中间层占主导地位的整合社会;在分化特性上,“结构化”和“碎片化”两种观点也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阶层分化正在形成固定化的、有持续影响力的、界线分明的阶级阶层结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的分化是多维度的、分散性的,具有一致利益认同的阶级阶层未必会出现。李春玲认为中国的阶层分化呈现出多元态势,“断裂化”、“中产化”、“结构化”和“碎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分化中都有所表现,但是,当前社会经济分化的主流态势是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即在分化形态上表现为多层分化,在分化的趋势特征上表现为结构化。

报告二是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均关于社会保障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报告首先分析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趋势。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比重已经达到7%,跨进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从1982年至今,已经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11个省市进入了老龄化地区的行列。以60岁及以上的标准计算,中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是1.32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0%。按照预测,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是:2030年,以65岁及以上的口径计算,将达到13—17%,以60岁及以上的口径计算则为19%;到2050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19—23%和26%。中国社会老龄化的特点,一是少子老龄化,二是家庭小型化,三是机械变动大。尤其是第三个特点将会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影响,目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城市,而中国社会对此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报告接着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分析。中国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三大社会保障系列,其一是城市的企业职工,他们依靠的是由企业支付的劳动保险和职业福利;其二是国家干部,他们依靠的是由政府财政保证的公费福利保障制度;其三是农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依靠的是由集体经济负担的集体福利保障制度。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在市场化的改革目标被确立后,非公企业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的份额扩大,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致使原来由企业支付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农村的“大包干”也使集体经济及其支持下的经济福利制度趋于瓦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因此被摆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由于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流动,国家干部的公费福利保障也被纳入改革的视野。

唐均指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是一个多重复合的体系,既有符合制度本身规律的“民生”的目标,又有诸如“社会稳定器”(政治目标)和经济改革的配套工程(经济目标)等其他目标。在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当不同的目标发生冲突时,民生的目标往往会在

让位于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而使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偏离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被赋予太多的“重任”，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具体而言，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着“窟窿”问题和“空账”问题，使人对其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着“公平性”和“可及性”两大问题。上述这些问题仅仅只涉及企业职工，国家干部和农民都还没有形成基本的思路和框架。所以，继续深化改革是迫在眉睫而又任重道远的。

关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瞻，世纪之初，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提出了“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向。所谓“基础”，即1，所有的保障项目都分成“基础”和“补充”两个部分；2，政府的责任是确保基本生活水平；3，补充项目以资产建设为本。所谓“整合”，即1，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整体；2，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3，收入保障、资产保障和服务保障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参照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经验，可以把“居者有其屋”的概念放进去，实现“资产建设”的理想目标。即在劳动年龄阶段，当个人账户积累到一定资金规模后可贷出用于购买住房，到老年退休阶段到年老急需用钱时可将房产质押或变卖以获得资金。报告最后指出，要解决中国老龄化社会面临的问题，并非有资金就行，适用和实用的社会服务也要尽快地发展起来。市场化的老年服务和由政府和社会提供的老年社会福利服务目前在中国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政府和必须尽快地重视和行动起来。

报告三是城市发展中心主任牛凤瑞研究员的“中国三农问题求解与城市化”。报告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按官方汇率计算），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5%以下，而城市化率仅为3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城市化的严重滞后不仅增加了工业化进程的成本，而且抑制了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实施城市化战略是中国实现经济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二，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中国三农问题的最大难点是增加农民收入。而增加农民收入的最基本办法就是改变农民的就业结构，减少农业就业人口比例。第三，推进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基本途径。中国目前农民家庭户均经营耕地面积只有8亩左右，即使亩均收入超千元，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2000多元。只有大幅度减少农民，农民人均耕地面积才能增加，农业才能实现规模经营，农民的年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天数，减少闲暇）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增加。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就是进城，就是使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市民。第四，农民大规模进城不会危及农业发展。对于一个经营6-8亩耕地的农民家庭来说，老少妇孺在家种田、养殖，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个别的农忙季节回家帮忙，集中地产出不减，又增加一笔非农业收入，是家庭成员的合理分工，也是社会劳动力资源整体的优化配置。第五，中国限制农民进城的依据已不存在，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使包括8亿农民在内的十几亿中国人民享有更高品质生活，拆除农民进城的制度障碍则是建设现代社会必须迈出的步骤。第六，中国农村的不发展是因为城市的不发展，中国目前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固然与农村为城市提供原始积累的时间过长、负担过重有关，也与长期城乡分制的二元结构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城市的相对不发展，在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不够强大。第七，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离不开进城农民。2001年中国城镇就业劳动力约为2.4亿人，其中进城农民约占40%，城市的运行与发展已经离不开他们。第八，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未来几十年将是中国以聚集为主要趋势的城市化加速时期。在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流动是必然现象。第九，国家对农村的支援要集中方向。适应农业家庭经营为主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提高效率着眼，国家对农村的支援应坚持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的指导思想，集中力量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加大对农村教育、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建设。支持农村医疗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的发展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第十，给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石。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给农民以进城工作、居住、生活的自主选择权，就是使农民获得了发展权。给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使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石。

第四报告是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国庆和专修大学大矢根淳副教授关于城市政策转变与城市社区再建的共同报告。李国庆首先对中国的社区类型划分作了分析。根据居民的社会与经济特征，中国城市社区可以分为街道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楼社区三种基本类型。在社区类型中，最为传统的是大多数人居住在平房中的街道社区，80年代以后大量流动人口居住在这里。平房的住户大多数是没有单位归属或在街道工厂就业的职工，职业杂，收入低。没有正式工作单位的人员档案存放在街道，工作安置、租借住房和生活保障由街道和居委会负责，是街道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主要管理对象。单位社区形成于50年代工业化时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它是中国单位承担的多元功能中的生活保障功能要求建立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功能组织的构成部分，而不是纯地缘组织，和街道社区一样同属于熟人社区。本世纪初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完成和住房商品市场的发展使人们自由地选择居住地点和环境成为可能，个体选择行为的集合效应对城市空间的社会特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商品楼社区是90年代以后迅速兴起的居住环境舒适，设备齐全，通过房地产市场流通的新型小区，居民的产权意识和自主管理意识很强。目前，北京市原有的街道社区、单位社区的居民构成正在分化，商品楼社区开始形成，并将成为象征未来的新型社区模式。

其次，李国庆强调，在研究中国城市特性时，关注国家政策对城市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视角。他以街道社区为例，分析了北京传统住居四合院是如何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从家庭再生产空间转变为大杂院的。典型的四合院是一个充满了家庭气氛的居住空间，北面的正房、两侧的厢房和倒座的主人按照在家庭中的角色排列居住顺序。在由四合院构成的胡同里，邻里之间可能结有各种关系，一条胡同里可能居住着同一个大家族，也可能互为姻亲，或者是几代人上百年的老街坊。50年代以后进入北京的流动人口住进了租借的平房院落，但是初期的四合院还是私人所有，是一种由房东主导的关系秩序。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政府首先收回了出租房屋的管理权，由房管部门负责出租和管理。文革开始以后，政府没收了全部私人的房产，房屋所有权改为公有制。房客从政府租借住房，与房东之间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于是，一个四合院里出现了多个主人，共同使用院落中的公共空间，四合院开始转变为大杂院。80年代以后，平房大杂院中的关系出现了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外地商贩大量进入平房，按统计有45万人之多，熟人社区转变为匿名社区。第二，彻底改变了平房四合院内物理空间格局的转折点就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院内公共空间搭建临时防震棚把过去的公共空间变为私有空间，邻里之间围绕着公共资源的分配出现了关系紧张。第三个变化是居民生活方式个体化，过去由邻里之间互相提供的援助转变为由专门机构提供的有偿服务，城市生活方式渗透到传统社区之中。总之，从城市社区类型入手，关注国家政策对城市的影响，是把握我国城市社会变迁的基本视角。

大矢根淳的报告题目是“北京‘胡同·四合院’的社区再建(renovation)”。城市再开发概念主要指城市基础设施的修复与更新，是一个包括地区重新规划和国土重新规划在内的范围宽泛的概念，它是1998年日本国土开发计划《21世纪的国土资源规划》中提出的国土规划四大战略之一。90年代日本进入平成不景气时代以后，出现了城市再开发热。这一变化引起了灾害社会学者的关注，因为灾害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就是研究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市民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大矢根从建筑学与生活空间学视角归纳了北京市区格子状街区的分割过程和宅地分割的模式，并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对1949年以后的城市规划法律与制度所规定的城市居民的居住方式与所有权的演变作了分析。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大矢根的分析颇具新意地指出，灾害社会学为观察北京城市变迁中的深层内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视角。他援引社会学家索罗金(P. A. Sorokin)的宏大的循环论的社会变迁理论，指出瘟疫和自然灾害席卷疲惫不堪的社会，不满把革命和内乱推向战争，使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社会更加疲惫。值得关注的是，这时“生活结构的抵抗”出现了，深受法律制约的人们会谋求对法律制度的灵活运用，以对抗险恶的外部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包括自由就业与自由居住权在内的“基本人权”与“公共性”之间会以集体转移、生活权补偿和故乡丧失等方式与外部环境对抗，以谋求生存机会。大矢根用灾害社会学的这一基本视角来分析10年文革动乱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对北京城市变化的影响。他注意到，正是文革这一社会动荡改变了四合院的财产所有权，一家一户的四合院出现了家庭的杂居，这是北京传统住居变化的第一步。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又带来了四合院物理空间的大杂院化，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北京居民开始相互帮助搭建抗震棚，共同度过了一段同命运共患难、同甘共苦的充满人情味的时光。但是随后这些临时建筑变成了永久建筑，接着出现了抗震棚的商品化，有些人甚至开始出租抗震棚，以增加收入。大矢根认为正是社会的动荡和自然灾害改变了北京城市传统住居的人与物的关系，从灾害社会学的视角对于把握北京胡同·四合院的人际关系和物理空间变化是有益的和恰当的。

在社会研究会上，经济学教授町田俊彦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作了中日比较研究。报告首先对中国和日本的行政体制构成的异同点作了比较。日本的行政体制是国家和都道府县以及市町村，地方政府分为两级，分配不同种类的税源。中国则是根据国有企业

的所属关系和分布状况，分省、地区和县级分配同种税源。在发达国家，日本和英国一样，政府间财政关系具有集权体系特征，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比例比较低。但是日本的两级地方政府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地方自治体，而中国的地方政府从制度上看是以中央政府为顶点的权力体制中的一个阶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有着比日本更加强大的集权的特征。中国由于分权化还不彻底，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拥有较大的管理权，而日本的地方政府只是对中小企业有影响力，这是两国的差异所在。

町田教授的报告重点在于比较中日两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对于平衡地区间财政水平差异的能力问题。日本的地方政府的经常收入中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的比例占41.4%。尽管税收分配中地方政府所占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幅度非常大，在最终支出分配中地方政府所占比例在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分散型”的特点最强。中央政府每年委托地方政府处理大量行政事务，这些行政活动都伴随着大量的财政补贴。政府间财政转移中的用于一般财源的财政调整制度发挥着缩小地方之间人均税收差异和行政费用差异的作用。在人口和企业较少的地区，人均税收较少，无法发挥规模效益。日本政府向这一类地区分配一般财源，从而平衡了税收较多地区与税收贫乏地区之间的地区财源，缩小了地区之间的财政与行政能力差异。

町田教授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具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垂直分割行政，二是租税立法权集中于中央政府，三是分散型的财政支出分配。四是与中央财政大幅度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的特点与日本非常接近。但是，两国又有着显著的差异，这就是日本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调整能力极强，而中国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对地方财政的调节能力反而减弱。日本财政以特定补助金为主要手段，起到了缩小平均行政差异的作用，而中国的财政调节机能及其微弱，地区之间的行政水准差异很大。这一特征可以称之为竞争分权制，主要表现在1995年以后返还额的递增率的计算方式，本来应该用附加税和消费税的增长率来计算，但是这种方式受到了富裕地区对大锅饭政策的批判，为了争取富裕地区的支持，政府后来改变了各地区的递增率。此外，2001年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额虽然增加了，但是返还的构成比例却下降到45%左右，补助额中以财政调整为目的的部分——包括定额补助金、过渡期转移支付和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不过10%。地方政府的纯收入中补助金额的比率提高到24.7%，而以财政调整为目的的补助额的比率却降到了2.4%。经济学家Dagmar Hauff在2000年曾经对中国以人均人均财政收入为目的的财政调整以及人均财政收入水平作了分省比较。他的研究表明，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调整能力弱化了。例如人均财政支出，最高的上海和最靠后的几个城市的差距，1993年上海是安徽省的7.8倍，是四川省的9.2倍，地区之间的财政能力差异显著。

町田教授最后指出，分税制改革把随机应变的政府间的财政收入的分配体系转变为把全部的财政收入明确分为中央政府固定税、地方政府固定税和中央地方政府共有税的体系。分税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在租税收入上提高中央政府的分配比例，恢复财政的健全化和宏观调控机能。但是改革之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机能没有充分发挥，主要原因是从制度上看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转移了，但是由于是以改革以前财政分配方式为起点的，因此各地政府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源转移额被返还了，税收返还之后地方政府间的税收分配和改革以前比没有变化。中国正在进行对地方财政调整制度加以改革，但是重要的不是调整方式，最重要的课题是在政治上如何控制富裕地区的抵抗，应该从政治角度着眼，把如何缩小地区行政能力差异作为调整的首要目标。

## 二、中国经济与产业研讨会的几个主题

15日中国经济研究会的第一个报告是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分四个部分作了报告。第一，2004年世界经济的特点、问题和启示。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世界多数地区和国家经济强劲复苏，经济增长点日益多元化，呈现难得的共同繁荣局面。全球贸易急骤攀升，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虽然美元相对于欧元不断贬值，但是国际金融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国际资本流动温和复苏。此外，全球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主要问题表现在，弱美元高油价的挑战；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威胁；利率走高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将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一体化中的周期因素强化；贸易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金融政策的协调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凸现；区域合作与全球经济的增长；大国经济的影响因素不断增强。报告接着分析了2004年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问题和启示。2004年我国经济形势的主要特点是，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全年经济增速在9.5%；宏观调控取得初步成效，一些不稳定因素得到遏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全年贸易总量1.1万亿美元；外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明显；物价水平先扬后抑。但是我国经济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导致油价上涨的因素仍未消减；受世界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下降低于2004年水平；资源紧张矛盾仍较突出，燃煤、电力、燃油、运输紧张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缓解；产品库存增加和相互拖欠现象有所增加。中国经济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巨大以及能源对世界市场需求上升，从而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报告的第三部分是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强化。除整体经济增长形势外，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影响是通过四个渠道进行的，即贸易、金融、投资和政策协调。随着中国加入WTO，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经济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具体表现为：中国成为世界跨国公司的重要制造业基地，加工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受外界因素的牵制增强，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突显；保护主义对外贸的影响突出，面临反倾销和技术壁垒等各种阻挠，要求人民币升值也是一种反映；与世界经济周期逐渐一致，特别是美、日、欧三大市场依然占我国进、出口的一半左右，其经济形势及全球经济的走向对我国外贸和经济增长影响很大；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和金融合作，在市场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扩大。不仅GDP增长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将近35%，是美国和日本的3倍，已真正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开放经济体，并且带来贸易格局的变化，为世界经济共同发展提供商机，带动了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众多国际机构在对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中，都把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作为一项主要因素。从市场角度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在很多领域影响到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对能源、粮食、原材料等的依赖也越来越大，需要从世界市场获得所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对世界经济的旧格局产生了影响。从经济政策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政策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参与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2004年，中国首次参加“七国集团”的财长会议，这标志着我们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对今后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孙杰研究员指出，可以说，中国已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而从中国对汇率和利率等宏观政策的运用方面，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处于一个与世界经济密切互动的新阶段。

专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大桥英夫的报告题目是从贸易动态变化的研究方法入手看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问题。首先，大桥教授对经济的国家化作了定义，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指贸易规模的扩大，占世界贸易比例相对上升，GDP中贸易所占比率扩大。二是与国际经济的接点扩大。国际收支发生变化，从对内投资（资本输入）转变为对外投资（资本输出）。三是交换手段变化，外汇管理体制变化，外汇汇率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四是与国际经济体制的统一程度提高，贸易惯例、规则和体制的容纳程度提高。按照这一定义，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就是中国经济融入当今国际贸易体制和分工体制中的过程。大桥教授分析了贸易理论的重大变化。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贸易发生在生产要素依存比率不同的国家之间；各国将其丰富的生产要素汇集起来生产出来的物品具有比较优势。但是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差距。在现实中，生产要素依存比率相似的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比生产要素依存比率不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有显著扩大。与此同时，产业间的贸易量比产业内的贸易显著增大。因此，新的贸易理论认为，决定贸易模式的不仅仅是对生产要素的依存，它还包括以下三个因素：技术代沟以及技术传播的时间差；生产周期理论，根据商品的生产周期来决定贸易的模式；实际需求，包括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大桥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为了填补国内供求关系的不均衡。进口是为了缓解因国内供给能力制约而导致的不足，出口成为进口的财政手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出现巨大变化，首先是包括粮食、农产品原料和矿物燃料在内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例从1980年的50.2%急剧下降到2003年的7.9%，其中粮食从17.2%下降到5.2%，矿物燃料从23.6%下降到2.5%。与此相对应，工业产品的出口比率急剧上升，同期从49.8%上升到92.1%，其中机械类从4.7%上升到42.9%，杂品从15.7%增加到28.8%。

大桥教授指出，一般认为中国的GDP中的贸易依存度高达70%以上，但是这一点需要从贸易形态来对贸易结构加以分析。以出口为例，

2003年一般贸易占出口贸易总额的41.5%，来料加工占12.4%，进料加工占42.8%，保税贸易占2.2%，由于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和保税贸易属于加工贸易，如果扣除这一部分，中国GDP对贸易的依存度即对外贸易中的一般贸易比重为41.5%，与日本相差无几，不应该过分夸大中国经济增长对贸易的依存度。在报告最后的东亚新的分工体制部分，大桥指出，东亚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日本为首的雁形形态被打破，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对生产技术和要素依存的悬殊带来的，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可以无时差地生产发达国家开发出来的新产品。过去的直接投资转变为贸易连锁，产品结构转变为标准模式产品的生产，工程间的分工和产业集聚正在形成。

报告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赵英研究员就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与现实作了报告。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阶段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这一时期是工业化的起步阶段，重工业成为工业化的中心，150个重点工程都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结构。国家意志起了重要作用，投资优先，外汇优先，出口优先和能源优先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富国强兵目标。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建成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但是存在着二、三产业比重失调的问题，这一时期重工业增长了90倍，而轻工业仅增长了19倍，轻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从70%下降到42%。第二阶段从1978年至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出现了以下几个变化，一是投资结构和方向转变，出现了以家电、轻工业带动的经济增长。二是过剩时代的到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商品过剩状态，虽然这还是一种相对过剩。三是国债支撑下的增长。到90年代后期，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重工业化特征，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后期加入WTO之后至今，中国经济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前中国结构的特点表现在第二产业增长再度加快，背景是中国已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汽车和住房成为居民有购买能力的最终消费产品。中国工业结构的状况特征是陈旧的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并存，传统产业以粗放形式发展，钢铁产量达到2.75亿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生产国。但是传统产业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紧张，对环境的影响加大。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高技术产品出口增加。但是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以加工贸易形式出现的，缺乏自主品牌，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此外，工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造成吸纳农业人口就业能力下降。

在展望21世纪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时赵英指出，第一产业将略高于90年代，主要途径是政策扶植和发展加工产业。第二产业将维持较快速度，主要目标是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向省能源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类似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是可能的，因为民营资本参与进来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的主要领域是技术含量高、咨询、文化、金融和电信行业，社区服务业和医疗服务业也具有重要发展前景。赵英最后谈到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他赞成日本学者渡边利夫提出的水平分工的观点，即日本研发最前沿的产品，生产关键零部件。中国主要是发展制造业，同时从事中低档开发。此外，中日之间的能源合作前景广阔，日本的能源技术既能够提高使用效率，又能够减少污染。再者，两国中小企业的合作前景也非常广阔的。

报告四，专修大学的张浩川以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国际化为题，介绍了“小型国际企业”带来的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很多中国的中小企业和海外进行了接触和交流，出现了一大批来料加工工厂，OEM工厂和出口型企业，可以看作中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的初始形态。但是这样的中小企业存在着致命弱点，即每有能力进行信息收集，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国际化，对外资企业的以来程度很高。因此，如何培养能够独立参与世界市场的中小企业，是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的重大课题。

日本的“小型国际企业”的定义是，把事业发展集中于自己最擅长的产品上，对生产技术进行不断挖掘提升，研制成独有的产品并推向世界市场，在保证10%以上的出口量（包括在海外生产）的同时，在世界市场拥有一定的占有量。企业的销售额在500亿日元以下，注册资金在10亿日元以内，未上市、独立的、非全能型的专业的中坚企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小型国际企业”的独自技术并不一定是所谓高新技术。事实上，日本的企业依靠的是与高新技术相反的“低旧”技术的挖掘而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他们对特定技术进行集中的钻研，创造出了他人无法模仿的独自的技术。这是从现有技术到独自技术的发展进化过程。例如制造出了世界上最细的超硬钻头企业的UNIONTOOL，制造出世界上最小的塑料齿轮的JUKEN就是这样的企业。

张浩川在报告的最后指出，在衡量一个企业的技术能力时，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往往成为一个重要标准。2004年10月在广州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上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小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占全国总数的65%，而且每年推出的新产品中，有75%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小型国际企业”的预备军，如四川省钢钎厂，青岛制钉厂和温州的大虎打火机厂以及上海三联汽车线束公司，“小型国际企业”在中国发展壮大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报告五，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张翼研究员就当前的就业形势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变化趋势作了报告。报告第一部分指出，中国的就业已走出最困难阶段。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达到预期目标的109%，比原计划多出8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0万人，达到全年目标的102%，其中帮助“4050”人员再就业140万人，达到全年目标的140%，可以说是就业形势和治理失业下岗形势最好的一年。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内地某些省份也开始面临招工不足局面。城镇登记失业率降低到4.2%，比2003年降低了0.1个百分点。

报告的第二部分指出，未来劳动力供给压力会减少。在未来数年内，我国新增劳动力会迅速下降。16岁人口会在2~3年内下降到2000万之下，每年净增加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在2~3年内降低到1000万之下，并长期保持在800~900万的水平上。这一方面预示着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会迅速上升，另外一方面也预示着青年壮工的供给数量会逐渐下降——高中和大学扩招的人数越多，青年壮工的数量短缺会越来越严重，城市底层劳动力工资的增长速度也随之会越迅速。在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人口提供的“红利”机遇，也会伴随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人口红利”的增加而消减，中国在世界劳动密集型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渐消退。

流动人口——尤其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口数量庞大，总量超过了1亿，但他们在城市存在着边缘化问题。这些已经被工人化的农民工，缺少正常的市民待遇，也没有被融入于城市之中，存在着社会结构的人为断裂——他们日益被塑造为城市里的“村民”。他们是打工的“候鸟”，将青春和健康贡献给城市的发展，将40岁以后的生命带回给农村。另外，虽然在农村、在数量上存在着一个众所周知的1.5亿的剩余劳动力，但事实上这些劳动力已经很难流出农村。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和农户的分散经营模式，需要比较密集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超过35岁以上的流出于农村的劳动力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岗位。近期以来的多项调查表明，80%的农民工年龄介于18—35岁之间。

劳动力人口供给总量在未来数年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失业率会自动下降。失业问题会长期羁绊我国的发展。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竞争力的人们，会逐渐被积淀到社会的底层，形成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正如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能够顺利就业而城市工人却存在较高的失业率一样，就业与失业存在非常复杂的社会动因。有研究表明，现在我国的城市低保人口已经超过2000多万，而农村的低收入人口也有差不多有8000万。

最后的第六报告是专修大学佐岛直子副教授的“中国的战略文化——肯布斯（Ken Booth）手法”。所谓战略文化不同于对外政策或战略，它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文化单位在安全保障上的习惯和价值，研究对象是国家、地区和文化单位，目的在于通过研究明确问题所在。战略文化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地理社会规范要素、文化基础要素以及思想和信条要素，例如地理条件、国家规模以及国民性和意识形态等。

佐岛对中国的战略文化作了以下分析。第一，从地理条件看，中国与14个国家相接，拥有很长的国境线和广大的国土，2003年GDP达到1兆4300亿美元，超过了俄罗斯。自然资源从出口转为进口国。已经成为世界和地区大国，很难规定中国究竟属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第二，从社会规范要素看，国家建设的态度是同时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主导。对内政策目标是维护安定团结，对外是与发达国家改善关系，维持促进与周边各国的良好的协作关系。国防军事目标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强化军事能力。第三，文化基础的要素中包括固有的汉族文化和中华文明，多种民族、宗教和语言，存在着少数民族问题。第四，意识形态和国民性中包括马列主义和中华思想，对历史的复杂态度：4000年历史的骄傲和屈辱的近代史。国民性中包含着对国力强化的渴望和民族主义。第五是军事的特殊性质，即革命与国家相统一的战争观。

佐岛最后指出，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的政治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军队指挥统制体系不够明确，让人捉摸不透；军事战略受人因素

影响很大。军队结构的转换意图以及合理化过程具有不透明性，军队经济以及军事预算、主要装备的征调计划以及现有数量具有非公开性。她在谈到对中国的期待时提到了四点，希望中国在维护地区平衡上发挥实力；对内政策更加透明；对地区安全保障实施总体参与；对全球计划行动负起责任。

### 三、研讨会是中日学术交流与共同研究的良好开端

两天的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16日上午社会学组参观访问了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街道和椿树园社区，下午访问了东城区交道口街道菊儿社区，与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干部座谈，参观了居民家庭。经济与产业组参观了位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同仁堂制药厂以及日本富士通公司中国总公司。

日本专修大学是1880年成立的拥有120年历史的综合性大学，位于东京都市中心千代田区神保町。大学下设经济学部、法学部、经营学部、商学部和文学部五个学部和研究生院，在校学生近2万人。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49年，迄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拥有研究人员155人。该研究所一直致力于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尤其以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研究著称。该研究所开展实地调查，出版月报、年报和研究丛书。

本次研讨会是两个学术研究机构长期学术交流的开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介绍相关研究领域的现状，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与变动趋势，从中寻找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通过两天日程紧张和讨论热烈的会议，圆满达到了最初设定的相互交流与相互了解的目的。城市中心主任牛凤瑞研究员与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柴田弘捷教授、事务局长村上俊介教授表示，今后继续举办学术交流活

(李国庆)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您是第 访客 - - 招聘信息 - - 投稿热线 - - 意见反馈 - - 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

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电话: 85195663

农村发展研究所网络室维护